

時代精神與話語轉變

——讀《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

● 雷頤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明清之際，中國的學術精神、內容、風格伴隨着政治的劇烈變動亦陡然一變，由義理心性之學轉向訓詁考據之學，由道德內省轉向文獻考證。這種突變與巨大的政治動盪無疑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這一轉變延續了二百餘年之久，並取得了至為輝煌、令人嘆止的學術成就，就不能僅僅歸因於政治的變動了。其中，必有頗為複雜的學術內在理路和外在背景的巨大作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

授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一書中，通過對這種學術的形成、發展之諸種內外因素的條分縷析，重現了明清以降中國社會與精神的「面面觀」。

一 從「道德話語」轉向「知識話語」

作者明確承認，自己的分析方法深受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 Kuhn)的「科學共同體」理論和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 Foucault)的「話語」理論的影響。這兩種理論的共同之處是，兩者都認為所謂「科學」、「學術」並非純精神、智力的發展，而強調「社會歷史」的作用。據此，學術的轉變也就是「話語」的轉變，「考據」的勃興與「義理」的衰落，標示着一種新的話語的崛起和知識譜系的轉換。而

學術的轉變也就是「話語」的轉變，「考據」的勃興與「義理」的衰落，標示着一種新的話語的崛起和知識譜系的轉換。

實證性研究方法的流行、「小學」話語的逐步形成，不僅是學術基本觀念變化的反映，也必然引發對傳統的認知、理解的重大變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餽釘瑣細、不涉世事，被認為「故紙堆裏討飯吃」的考據之學，卻是從對長期被奉為圭臬的儒家經典的懷疑、批判開始的①：

傳統儒學經典一度擁有的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在那時即受到知識階層日趨尖銳的挑戰。這種挑戰明顯反映於他們的語言、教學、天文、地理、金石等方面的實證性研究之中。十八世紀的知識份子，運用這些研究成果，重新審視儒學遺產眾多理論的合理性，從而對宋明儒學經典解釋中充斥的空疏之風極為不滿。儒家經典受到全面懷疑，並經由史學化，變成尋常的史學研究對象和材料。這是知識階層思想變化最顯著的標誌。

阮元(圖)對樸學的貢獻尤著，他在杭州為官時利用編修《經籍纂詁》的官舍創辦詁經精舍，後任職廣州時又開辦學海堂，二者均成為樸學重鎮。



「六經皆史」，可謂這種挑戰的概括。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便是這種懷疑、挑戰的代表作。「疏證」、「辨證」、「補證」、「正誤」等，漸漸成為具有中心地位的專業學術概念，也即要以訓詁考證來探求經典義理。戴東原明確說道②：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

王鳴盛亦認為③：

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現，道在其中矣。

這實際說明了訓詁學的理论預設(presuppositions)，即訓詁決定義理，所有「經典」都必須經過嚴謹細密的考證才具真實性與神聖性。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不容懷疑、批評、考證的「聖經」。而且，「這些預設根據它規定的知識範圍和檢驗方式確定進行考證的對象。凡是不適於這種全新考證方法的內容都受到排斥。」④無疑，這是一種批判的理性精神。究其實質，訓詁考證的意義必然超出一種輔助性工具範圍，而產生一種社會政治影響。實際上，歸莊、方東樹、翁方綱等人已經意識到這種「考證」將引發理學正統的廢黜，因而憂心忡忡。但這也說明戴震、閻若璩、顧炎武等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法擺脫宋明理學的巨大影響，目的仍是要發現古

代聖賢的「真諦」。直到清朝中葉吳派經學大師惠棟的出現，才標誌着考據學界實現了一種至為關鍵的觀念轉換，即將音韻、訓詁、考據視為一種充滿魅力的「純學術」課題，實現了由「道德話語」向「考據話語」的轉變。

當然，「考據」並非此時才有，唐宋元明歷代都不乏考據之作。特別是晚明^⑤：

對於考據學自我覺醒的潛意識出現了，人們開始追求新的學術方法，只有這種方法，才會使考據學成為一種具有自足性的學術話語。明代許多學者的研究和著述充滿了個人主義、有時甚至是英雄主義精神，他們醉心於尚未開拓或研究的知識領域。……明代考據派學者作為新學術話語的開創者，在一定程度上為考據學贏得了某種相對於其他知識領域的獨立性，這使後來的學者有可能在他們開拓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實際上，考據學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要歸結為晚明對儒學正統的批判，正是這種批判減弱了「正統」的權威性，使提倡懷疑的考據學成為可能。例如，強調「個人」的泰州學派對「考據」學派便有着無形的影響，使在學術領域強調自主意識成為考據學話語的重要特色。但此時考據話語畢竟只居「邊緣」位置，隨着學術的發展，「清代學術話語革命在考據學者中形成共識，即學術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事業，任何專門學科的進步都取決於對專業考證方法的應用。」^⑥「考據」終被推上儒學

話語的中心位置，成為佔主導地位的主流話語。道德話語為知識話語取代，對客觀性知識的追求壓倒了主觀性的內聖理想，是非判斷改變成真偽判斷。中國思想史中出現了少有的重智論思潮。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理學「天人一體」神聖繁複的宇宙論為實實在在的天文曆算所取代。戴東原、焦循、阮元、王錫闡、程瑤田、錢大昕、梅文鼎等人都曾用數學方法研究、檢驗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和理論。作者在對梅文鼎的研究中發現，梅文鼎已把「理」歸納為借數學推演即可把握的實體，因而改變了「理」的內涵，使之不再是宋明理學中神秘的「理」。「在清代從象術學向數學科學轉變中，數學在儒學話語中的運用使之出現了根本性變化。」^⑦另外，金石之學在有明一代主要是藝術鑒賞品，金石家關心的是藏品的形制、色澤等藝術欣賞價值，並不着重於語源考釋。而清代金石家則一反前朝重鑒賞輕考古的風氣，將「金石」由審美對象變為求知對象，使金石之學成為顯學，成為考據學的主要內容，以補文獻之不足。

隨着「內容」的改變，「形式」也發生相應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札記」體取代了宋明理學流行的「語錄」體。宋明理學家的作品大都是道德內省、抽象思辨的記錄，泰半以問答、格言、論辯等形式出現。理學大師的學生們總將老師的言論恭恭敬敬逐句記錄在案，奉為經典。這種形式，無疑與以文獻考證取代道德反省的樸學研究不相適應。只有「札記」體才能承擔起各種

清朝中葉吳派經學大師惠棟的出現，標誌着考據學界實現了一種至為關鍵的觀念轉換，即將音韻、訓詁、考據視為一種充滿魅力的「純學術」課題，實現了由「道德話語」向「考據話語」的轉變。

作者在對梅文鼎的研究中發現，梅文鼎已把「理」歸納為借數學推演即可把握的實體，因而改變了「理」的內涵，使之不再是宋明理學中神秘的「理」。

由於「札記」體能承擔起各種零星史料、文獻、版本等類資料的搜集、疏證、考信、校勘工作，自然成為適用樸學研究的新的流行形式。

零星史料、文獻、版本等類資料的搜集、疏證、考信、校勘工作，自然成為適用樸學研究的新的流行形式。「體系的時代」遂為「分析的時代」所取代。這種新的形式，必然要求並引發一種新的學術規範，即高度重視文獻引證、對前人及他人的研究成果旁徵博引、詳註出處，嚴格確定學術的「發明權」。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剽竊抄襲，激勵學術的長期積累和進步。近代「專利」制度的建立對科技進步所起的巨大作用，也能曲折地說明「發明權」的確定對學術進步的作用。可以說，引證資料、註明出處、承認他人成果等成為考據學的重要形式、標誌，實也是這種新的學術話語能夠長期確立、難撼其固的關鍵因素之一。這裏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學術研究的現狀，各種鴻篇巨製從流水線上源源不斷製造出來，但多是游談無根之作，引證他人成果而明註出處者極少，掠人之美且不以為然已積非成是。若細細檢查便不難發現，許多貌似厚重的專著竟難以尋覓真正屬於作者自己的「一孔之見」。這樣，為學只是輕而易舉地「綜合」他人成果，而無需艱難地獨創己見。結果便是學術一直在低水平上重複，難有進步。儘管不乏「轟動效應」，但一種新的學術話語卻難以真正建立起來。

二 政府、民間與學術 機制

如果說話語是一種權力，那麼一種佔主導地位的話語為另一種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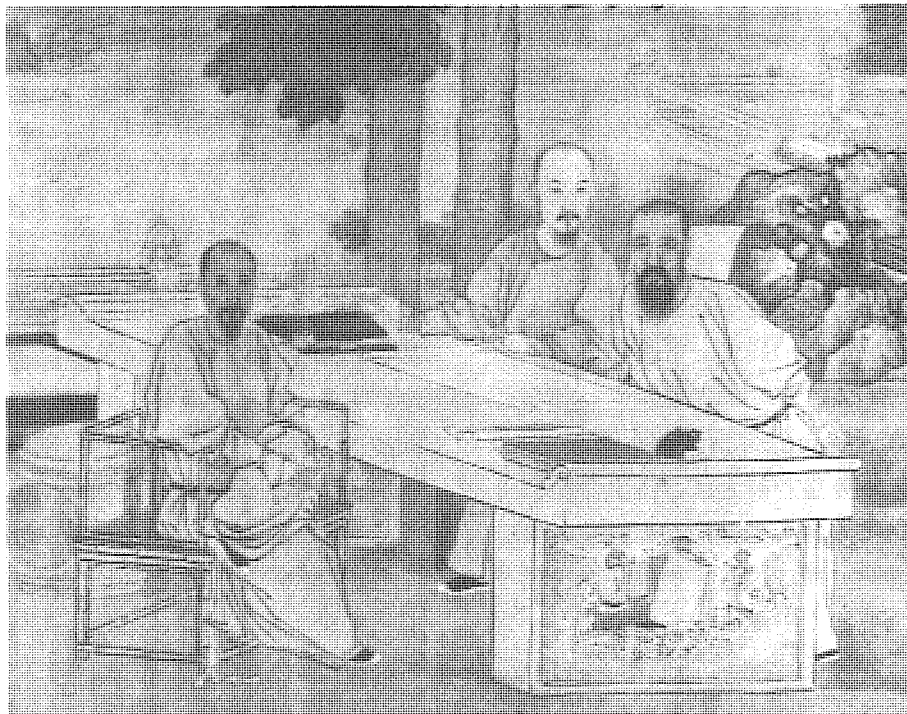
語所取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所以相對於學術轉變的內在理路而言，作者以更多的篇幅對外在環境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

大體而言，外部環境可分為「政府」與「民間」兩部分。就政府方面來說，清代文禁森嚴為眾所周知。但清代文禁多是政治性的，對學術領域的涉及並不算多，學者在選擇研究課題上仍有一定的自由度。若用流行術語來說，滿清政府實行的是「專制」統治而不是現代型的「全能」統治。在「專制」政治中，「只要不反對我，就能存在」。而在「全能」政治中，「只要不讚頌我，就不能存在」。也就是說，「專制」政治還容有考據一類「純學術」的一席之地，而在「全能」政治中，連這種空間都要封殺。作者認為^③：

文字獄只是清代文化教育政策的陰暗一面，這項政策還包括經費支持、學校獎助、官方對學術的認可、強化教育的特定作用，鼓勵學術發展的另一面。事實上，沒有清朝文化政策為考據學者發展規範化提供的先決社會條件，考據學研究就無法大規模地展開。

正是在朝廷的默許下，許多官員競相贊助學術，這是考據學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

如清代徐之文、徐乾學兄弟曾先後主持《明史》及《大清一統志》的編修，網羅了閻若璩、胡渭、顧祖禹、劉獻廷等一批學者，使之能在動盪的環境中安心向學。安徽學政朱筠招聘許多漢學家入幕，參與諸如《說文解字》的校勘、再版等工



清代考據訓詁之學得以繁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學術脫離政治的羈絆，這對當下中國學術的重建工作，尤具啟發意義。

作。入幕的有孫星衍、洪亮吉、汪中、黃景仁等，均為學界代表人物。朱氏還與戴東原、王念孫、邵晉涵、章學誠等過往甚密，並給予財政資助。官至湖廣總督的乾隆進士畢沅，本人為惠棟弟子，專治經史而旁及小學、金石、地理，聘武億、凌廷堪、盧文弨、汪中、孫星衍、梁玉繩、江聲、錢坫等協助編書。特別是他長期給章學誠的巨大幫助，不僅使之能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有時甚至為其配備助手。章氏的學術成就是與畢沅的資助分不開的。阮元亦為乾隆進士，歷山東、浙江學政而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始終傾全力贊助學術。受其資助的學者難計其數，一些名藏書樓也受到了他的種種幫助。貢獻尤著的是，他在杭州為官時利用編修《經籍纂詁》的官舍創辦詁經精舍，後任職廣州時又開辦學海堂，二者均成為樸學重

鎮。對不同的學術觀點，阮氏能兼容並包，曾將樸學家江藩與著名的桐城派理學家方東樹招至麾下，一方面為江氏的《漢學師承記》作序，另一方面又對方東樹批評此書的《漢學商兌》評價不低，巧妙地處理二者的爭論、協調二者的關係。可以說，大批一流學者參與官員們互相競爭的課題中去，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互相交流切磋、查閱譜本文獻、搜集地方史志的難得機會，自有益於學術的發展。大體說來，這些學者不是入幕為賓就是在書院任教，皆能清心學問。他們的著作當然只有學術價值而毫無商業價值，故只有得到資助才能出版。但官員的個人資助畢竟有限，能長期得到「高額」資助的多是成名學者，大量默默無聞的莘莘學子還是難獲資助。而且這種資助頗多變故，除去官員個人好惡不論，一旦失官或故去，其「門徒」便風流雲散，不得不

另覓棲枝。因此對學術更經常、更大量也更重要的資助，便來自民間社會。所以考據話語源自物產豐富、經濟發達、工商繁榮的江南地區，就不是偶然的了。

江南歷來文風鼎盛，加之揚州鹽商富甲天下，因此江南商人尤其是揚州鹽商對學術的發展投入大量各式各樣的資助。許多學者就是出自商人之家。如閻若璩來自鹽商世家，阮元的母親是揚州鹽商之女，戴東原是布商之子。許多書院都得到商人的大量資助，而揚州的安定書院、梅花書院等更以鹽商子弟為主要招生對象。阮元在杭州、廣州創辦學堂都得到當地商人的捐助。在江南商人資助或開辦的「私學」中，考據佔有中心位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藏書樓、圖書刻印等都得到了商人的支持，許多富商本人就是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正是這種「官—商—學」三界的良性互動，形成了學術研究、交流、資料搜集、成果出版互相配合的一整套良性學術機制，使江南地區形成了以考據話語為中心的學術共同體。這一共同體通過參與清廷的修史、編書、刻印等種種官方學術活動，將江南考據話語傳向北京，又以北京為傳媒向全國輻射，終於成功地突破地域／邊緣性，成為普遍／中心性話語。

學術史的重大變化與發展，往往是與社會結構的變化緊密相關的。回顧這一段學術史不能不使人想到，值此中國社會轉型之際，官方、民間與學者間如何實現良性互動、造就新的學術機制，恐是今後一個長時段重建中國學術、決定中

國學術話語、風貌的關鍵時刻，責任確乎重大。

三 人生態度的轉變

由義理轉為考據，由道德中心轉為求知中心，這不僅是中國知識階層的關懷對象和認知對象的轉變，更是一種人生態度的轉變。長期推崇「君子不器」的「通儒」遂為「專精一門」的「專才」所取代。這種「知識性認同」自然創造出「職業性認同」，治學真正成為一種「職業」。這一轉變表明了儒學家的地位和角色的轉變。

經過一番分析，作者對江南地區「考據學派」的職業化作出如下定義^⑨：

(1) 考證派學者都屬一種特殊專業的成員，這種專業是在廣泛研究和知識訓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研究和知識培養通過向他人提供專業服務和諮詢獲得經濟支持和贊助。他們的學術角色和社會作用已實現了職業化。

(2) 行業的標準從對理學和經世學知識的系統研究改為掌握特定考證學領域的專門知識，這是它向職業化轉變的標誌。

(3) 掌握考證學方法專業知識的目的是保證這一特殊學科的形成、發展和傳播，這些專業知識服務於考據學積累性的知識系統。掌握這些知識就將考據派學者與官僚、紳士及外行區分開來。

(4) 考證學研究的專業內容和方法沒有政治色彩，因而能夠避免局外

考據學派的「職業化」使士人的擇業標準發生重大變化，學術的成就是以與從政的榮耀相頡頏，讀書人對訓詁考據的重視明顯超過了仕途經濟。

人的評判。所以儘管考據學派極其缺乏擺脫政治及在社會經濟方面束縛的自治權，但這並不改變他們學術活動專業化的本質特徵。這種「專業化」即屬於我們稱之為「職業」的範圍。

考據學派的「職業化」使士人的擇業標準發生重大變化，學術的成就就是以與從政的榮耀相頡頏，讀書人對訓詁考據的重視明顯超過了仕途經濟。這就改變了以「入仕」為讀書人最高、也是唯一標準的狀況，使學術開始「非政治化」，從政治中分化出來，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學術的專門化、職業化又通過對研究範圍與方法的界定，使有關研究者在研究目標上取得共識。這種共識又轉變為通行的研究方式並產生共同的衡量標準，這就形成了一個具有交流、評判學術成果的複雜網絡。結果，必然使學術共同體的成員自覺承擔推動學術進步的重擔，遵從學術規則。學術目標與方法的一致性，確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職業化是學術系統得以延續、傳播、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專業知識得以累積、進步的必要條件。作者進一步認為這種學術的職業化及良性學術機制的建立，「具備了實證科學的許多特徵。它們經過適當的調整（在二十世紀成為現實）即可滿足現代科學的需要。進行這樣的調整，要比我們設想的容易得多。」^⑩

不過，涉世無多的考據之學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發展繁榮。隨着乾嘉盛世的逝去，各種社會矛盾在十九世紀逐漸尖銳，經世之學開

始向樸學挑戰，其代表人物為賀長齡、龔自珍、魏源、陶澍等。此四人除龔自珍外，餘皆湖南人。鴉片戰爭，尤其是太平天國的造反，把江南地區考據學派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掃蕩盡淨，考據學派亦迅速衰落。相反，湘學、粵學卻異軍突起，憑藉其在內亂外患中的經世之功而佔據近代中國的中心話語位置。而隨着西學東漸，漢宋之爭為中西之爭所取代。

不過，考據話語卻並未消失。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國學大師」的學術研究表明，清代考據學派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話語存在着直接的連續性。在當下中國學術的重建中，考據話語必將再次佔據不容忽視的地位。在現代條件下如何承繼、改造、光大這一遺產，當是創造真正意義上「中國學術」的重要內容。

涉世無多的考據之學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發展繁榮。隨着乾嘉盛世的逝去，各種社會矛盾在十九世紀逐漸尖銳，經世之學開始向樸學挑戰，其代表人物為賀長齡、龔自珍、魏源、陶澍。

註釋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reface; pp. 26; 43; 35-36; 180-81; 17; 98-99; 137.

② 戴震：《戴震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頁146。

③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

雷頤 1956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副主編、副編審。